汤若望与顺治帝

林铁钧

十六世纪末，天主教伴随西方殖民主义走向东方，发现了中国这块“新大陆”，可以为它提供一个非常广阔的信仰区域。尤其明后叶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在华传教的顺利进展，加深了传教士们这样的印象：“使东方的伟大文化民族归依天主教，似乎要成为事实了”。①汤若望就是怀着这个“崇高理想”自愿申请到中国来的。

顺治帝亲政十年（1615—1661）间，汤若望与福临有过密切交往，他受到皇帝的知遇与信任，破格的晋升和优厚的封赐。对于一个未满十四岁的少年君主来说，他的思想成长过程无不有汤若望影响的痕迹。然而，尽管汤若望当时在华传教已经二十多年，终究没有洞悉中华民族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对于维系这个古老封建帝国的生存有着重要作用。他竭尽心力，想用基督教义劝化中国“人主”信奉“天主”，从而把这个东方大国变成天主教国家。汤若望毕生投身这一“神圣事业”，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

一

汤若望，原名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约翰·亚当·沙尔·封·白尔，1592—1666），出生在德国可仑城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从小便接受耶苏会设立的贵族子弟学校的教育。十六岁时进入罗马德意志学院，以优秀成绩修完三年课程，然后加入耶苏会为会士，开始对数学（包括天文、历算）和神学的专门研究。1618年受罗马天主教耶苏会派遣来华，1623年1月（天启二年十二月）到达北京。自1627—1630年间被派往西安外，汤若望生活和工作都在北京，一直到他逝世。

天主教如何成功地开拓中国这个广大的信仰地区呢？根据利玛窦在华多年的经验，史学前辈陈垣老概括出六个条件，即奋志汉学，结交名士，介绍西学，译著汉书，尊重儒教和排斥佛教。陈先生认为：“这六个条件可以定其成功，也可以定以后来华之外人成功与否”。②此种论断是很有见地的。

汤若望和其他传教士一样，首先是用西方历法、天文学和新式技术作为通行证，进入封闭状态的古老帝国的大门。清军占据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命“虚京城之半以屯兵，尽驱民出城”。③汤若望以请求保护教堂图书经典和天文仪器免遭损失为名，初次结识了大学士范文程。他向范文程解释传教士来华目的，着重介绍他用西方新法对历书进行精确的计算，从而引起清廷的极大关注。

新朝定京，1644年7月间钦天监呈进依大统历制定的历书，多尔衮据范文程回报，指出“这种舛错百出的历书，其预测上不合天象，下不应地事。有一位名汤若望的欧洲人，曾制较佳之历书，尔等从速将此人唤来”。④于是，汤若望被召到内院，呈交他对时历进行科学测算的图表，系统地提出旧历书的七大错误，并保证他可以在7月份内将次年（1645）的历书修成。7月29日，汤若望上启摄政王，请求允许复制天文仪器，并把9月1日将要发生的

日食推算详情呈报，希望届时派有关官员共同测验，公开与大统、回回旧历挑战，“王从其请”。⑤8月3日，清廷采用汤若望从西洋新法修成的历书，定名《时宪历》。多尔衮命令“自明岁顺治二年开始，颁行天下”。⑤

西方科学历算帮助汤若望获得首次成功。1644年9月1日是汤若望在中国事业的一个关键时刻，朝廷专门派遣大学士冯铨等二人会同礼部官员，在观象台上同时用大统、回回和新历的计算方法测验日食，是时“日食，其时刻分秒及方位，按西洋新历推算均合，而大统、回回两历俱差时刻”。⑦不仅如此，汤若望还把全国各大城在这一天所见日食时刻，全部计算列表，其结果完全符合。12月23日，清廷任命汤若望为钦天监掌印官（监正），1646年7、8月间加封为太常寺少卿。正如汤若望自己所说的“除天主的庇护外，传教会之得以在中国立足，唯一所依恃的，是天文数学”。⑧

一个西方传教士充当清廷官员这件事，在耶苏会内引起轩然大波，反对者列举十大理由，认为他违背耶苏会誓约，与圣经和天主学说相悖，触犯教会法规。这个官司一直打到罗马教廷。然而，汤若望经过一番严肃认真考虑之后，断然接受这一任命。因为第一，如一再辞谢皇帝委任，就会被看作大不恭敬，或被认为此举乃传教士对故明王朝恋眷尽忠的表示，其后果不堪设想。第二，对天文历算表现出才能并已获得新朝信任的汤若望，尚且辞退这种职务，那么传教士今后在华与否，便是可有可无的了。它可能遭到反教者的攻击而无所倚恃。第三，更重要的，汤若望可以渐次把钦天监完全置于天主教徒手中，使自己站住脚跟，便于与上层建立广泛联系，利用优势的科学技术获得信任，开展传教活动，取到合法地位。

耶苏会传教方法的特点，即所谓“结交名士”，其实是把传教重点放在朝廷贵族、官员和士大夫阶层。因为这一层人掌握权力，影响大，他们的向背起决定性作用。汤若望做了大量有效工作，比如结识大学士范文程、冯铨；与礼亲王代善多次交往；为即将举行大婚的顺治皇后治病祈祷，受到皇太后的格外礼遇。他更善于用上天示警的预兆，进谏统治者尽量不要采取激发矛盾的措施，如指出英亲王阿济格军队在山西的劫掠不合天意；劝阻多尔衮集中大批匠人和向直隶等九省加派二百五十万两银，为自己建造豪华宫殿。为此，汤若望受到满族贵族的器重和尊敬，在朝廷官员中颇有威望。但他比其他来华传教士更高一筹，就是通过钦天监这个特殊官职，通过广泛结交宫内外宗室权贵，去接近顺治帝，争取信任，以皇帝为突破口，进而实现耶苏会在中国的使命。

摄政王多尔衮逝世后，1651年2月1日（顺治八年正月十二日）福临亲政，这时汤若望已是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对于少年皇帝来说，汤若望是个学识渊博，上晓天文下识地理的“通天”人物。他又能够制造各种天文仪器，铸造火炮，设计要塞图样，构造起重器械，后来又为皇帝制造可于北海行驶的双桅帆船，并在北京宣武门内仿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建造了一座大教堂。他除了通晓拉丁、德、意、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文外，还精通中国的文字与语言，是个地道的中国通。他在华的著述以天文历算为主，多至二十余种，著名的有《远镜说》、《恒星经纬图说》、《交食历指》等，而传教书籍仅《主制群微》二卷、《主教缘起》五卷及《真福训铨》一卷（后两者系抄本，无刊本通行）。他从西方带来大量书籍，“在这里他所有的，大致上说是他那个时代的全部知识，他还经常让人们由欧洲向中国，给他邮寄学术上是最重要的刊物”。⑨显然，在中国，汤若望是当时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宗教的代表。在他身上，既体现了多才多艺的实用科学力量，又贯穿着神秘色彩的西方宗教精神。处于求知欲最旺盛时期的顺治帝，汤若望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顺治帝是在多次派

人侦察了汤若望的私生活、确认他的“毫无可非难的贞洁生涯”之后，才下决心亲近他的。

二

顺治帝实际掌握国家权力时还未满十四岁，一般说还是个孩子。但是，他从六岁登基，民族矛盾，宗室纠纷，叔王专权，目睹耳闻，环境决定他过早地成熟。他天资聪敏，有强烈的求知欲，从小就意识到要努力创造当皇帝的一切条件。由于多尔衮的碍挠，他从小没有受到帝王应有的文化教育，反而放纵他围猎骑射，嬉戏度日，临朝后“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⑩多尔衮超越皇帝专横朝政，“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⑪使他感到孤单和压抑。所以，当这个少年一旦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时，其性格的另一方面很快地暴露出来，急燥、易怒、刚愎、自负、不易接受规谏。

汤若望在顺治眼里，则是一个十分受尊致的老人，皇帝用满语称呼他“玛珐”（即可亲可致的尊长、长者）。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尊称，是因为一开始顺治就对他怀有好感。例如，皇帝在北京登基和亲政的日期，都是汤若望根据时历选择的“黄道吉日”，福临1644年旧历九月十九日到京，仅十天的准备即登大极；而亲政则在多尔衮丧期一个月之后，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不早不晚，恰到好处。又如，据魏特《汤若望传》记载，顺治亲政后在一次议政王大臣会议上，曾经“很感激地提及汤若望神甫，因为他使他注意到他的皇叔的专权并且曾预言他的皇叔可能不久于人世”。汤若望胆敢说出这种招致杀身大祸的话，说明他早已站在受压抑的小皇帝一边。所以，顺治帝亲政半年后，在9月的一天之内，加封汤若望三个衔头，最后一个品衔太常寺卿管钦天监监正，使他从正五品晋升为正三品。

正因为汤若望手里有“王牌”，他也就俨然以“师尊”“长老”自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顺治帝施加影响。

第一，学习。亲政以后，顺治帝勤奋学习，博览群书，汤若望更是他的活字典。汤若望尽其所知，解答了有关天体行星运转，日食月食产生的原因，慧星与流星的出现，起重器械构造，国家政事得失，官员品行优劣等等问题。顺治帝无所不问，什么都想知道，如饥似渴地追求各种知识和新奇事物。仅1656至1657两年间，帝亲临汤若望馆舍叙谈求教，无论白天黑夜，竟有24次之多。

第二，劝诫。就是对顺治的某些言行作出规劝和告诫，提醒他作为皇帝的责任。比如劝他力戒淫乐，节制围猎骑射，以免荒废国家大事；因为他对西洋枪炮素无训练，不宜滥加施放，避免发生意外；吸取明朝复灭的教训，不要把一切事务都委托内宫太监去办理；希望皇帝不要北上祭祖，以杜京城谣言，保证王朝稳固统治；为君王者应以宽厚仁慈对待百姓，懂得载舟复舟的道理等。诸如此类的劝诫，不胜枚举。显然，劝诫是在两人平心静气面对面交谈中进行的，气氛比较缓和，在大多数情况下，顺治帝能够接受。

第三，进谏。就是对顺治帝的一些错误决策和实施进行谏正，要求他收回成命，可少年皇帝刚愎、自负，又有生杀大权，这样做是要担风险的。1659年8月，郑成功率十几万水陆大军北伐，迅速攻取瓜州，陷镇江，破京口，兵围南京城下。很短时间内，收复和招降了江苏、安徽境内三十余府州县，江西、浙江等省也有响应，在江南掀起了一次抗清高潮。顺治帝被这突其而来的局面吓坏，他想逃回沈阳的打算被皇太后斥为丢弃祖先功业的懦弱行为，于是老羞成怒，声称要御驾亲征，即使战死也在所不惜，竟拔出宝剑，劈碎御座，宣布谁胆

放阻止他就同此下场。这一鲁莽行动，引起满朝文武和全京城的恐慌，连皇太后与皇帝奶母都劝阻不得。汤若望当时认为，传教士已在中国打开局面，如顺治一旦出事，皇基动摇，教会必随之受影响。于是他接受文武官员的请求，冒剑劈的危险前去请谏。他等待皇帝头脑冷静下来后，上疏陈述此举动的利害关系，策划在不需亲征的情况下如何打败郑成功的谋略。顺治终于接受进谏，改变主意，一场虚惊总算过去。关于此事，《北游集》记载云："上一日语师，朕前者因海氛之警，将亲统六师，届于南徐，会江宁捷至中止"。纯系遁词，江宁捷至在9月以后，汤若望的进谏显然起了作用。为此事皇太后和大臣们包括顺治帝本人，都十分感谢他。顺治甚至认为，只有汤若望的进谏，才是完全出自"纯粹洁白的目的"。"如果我读了他的奏疏禀帖，我就被感动得几乎要下涕了"。⑫

汤若望的进谏和建议很多，对皇帝为人处事诸方面帮助甚大,权奏疏禀帖就有三百余件。顺治帝特意从中选择一部分，随身携带，便于随时取阅查询。所谓"迄今龙髯初远，发箧陈书，幸得窥伏蒲叩阍之一斑"，⑬即指此事。陈垣老说："吾曾谓汤若望之手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⑭就这个意义而言，汤若望是当之无愧的。

第四，传道。汤若望几乎用全部精力，煞费苦心地施加各种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向皇帝传布上帝的福音。

汤若望认为顺治帝有受劝奉教的可能，因为他年轻，思想尚未定型,有强烈好奇心，且对这位老人"事神尽虔，事君尽职"⑮甚为钦佩，对他的为人和信仰又颇感兴趣。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里，以较多篇幅叙述他如何小心谨慎，讲究方法，向皇帝传道劝奉，决不贸然地把这个完全陌生的洋上帝，强加上这个东方大国君主的头上。他利用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大自然规律的敬畏心理，把自然界的变异与其统治的凶吉联系一起，所谓"天人感应"，宣称这是天主对人主的示警和告诫，从而诱导帝发问：谁是这位上帝？上帝和皇帝是什么关系？怎么能够消灾逢凶化吉？这样，汤若望自然地讲授了天主教的基本知识，且详细解说做一个真命天子，必须遵循"十条诫命"的道理。⑯

据《汤若望回忆录》记载，为了传道，他和顺治帝进行过多次长谈。同时，"我曾屡次把这同一事实，讲给中国士大夫们听，可是，从他们天生那种自负自傲的态度中，却把救世主为我们所受的苦难视为是一种愚妄行动，或者根本不注意听我的讲述，甚至加以讪笑"。还有一次，当皇帝"竟要亲自象教徒们一般，向自己的额部上、口上和胸前画十字圣号时，他的护从中却有一人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竟使他未克完成此举"。仅此两事，可以看出，在清廷上层甚至在皇帝周围，有一股强大的反教力量。1658年以后，顺治帝亲近佛教禅师，汤若望"瞧出这是恶魔的干涉阻挠"，只好"结束了他向顺治皇帝劝化信奉天主教的尝试"。

三

汤若望自认钦天监监正以来，他对天主的虔诚和对皇帝的忠心，通过大大小小事例，深深地打动了顺治帝。所以，他得到的恩宠也是史无前例的。1651年，除任钦天监监正外，加封了太常寺卿等三个品衔。1653年（顺治十年）钦赐"通玄教师"荣称，并发布谕旨，褒扬汤若望为官忠勤。1657年，钦赐于北京天主教堂立碑，御制碑文，并赐教堂扁额《通玄佳境》。同年冬，又授通政使司通政使。次年正月初一日，被晋封光禄大夫，为朝廷极品官员。

一位"洋和尚"得以步入仕途，且高官俸禄、青云直上，是为了要表彰西方传教士在中

国传布天主福音的功绩吗？是为了要肯定基督教义取代孔孟之道，作为千百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吗？当然不是，顺治帝所以这样做，其一是奖偿汤若望对清王朝的杰出贡献。他在赐“通玄教师”的圣谕中，只字未提布教之事，而是赞扬“汤若望来西洋，涉海十万里”，“精于象纬，闳通历法”，“为朕修大清时宪历”，受官之后，忠勤可嘉。故赐予称号。以后在北京天主堂前立碑志功，御制碑文的强调“朕仰承天眷，诞受多方，适当正位凝命之时，首举活历明时之典。仲秋月朔，日有食之，特遣大臣督率所司，登台测验，其时刻分秒起复方位，独与若望预奏者悉相符合。及乙酉孟春之望，再验月食，亦纤毫无爽，岂非天生斯人，以待朕创制立法之用哉”。⑰可见，当时顺治帝认为，“朕惟国家肇造鸿业，以授时定历为急务”，而身怀此绝技的汤若望毅然受命，修定了应天顺时的历书，以此证明清朝乃顺天而治。对汤若望如此破格加官晋级，是表彰他修定历书，为皇帝司天。其二，顺治帝在圣谕和碑文中，把汤若望树立为忠君榜样，官员模范。他认为自幼年起，汤若望忠实于他，甚至政治上和他站在一起。亲政以后，又以和蔼长者情谊。谆谆教导他修身治国，敬天爱民；提醒他体贴下情，匡正时弊；希望他从谏如流，克已宽人等等，对顺治思想成长无不有良好影响。汤若望为官以后，十数年如一日，“祗承朕命”，“益勤厥职”，尤其他对天主的“敬慎蠲洁，始终不谕，孜孜之诚”的精神，更为可贵。如果“人臣怀此心以事君”，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总之，汤若望对顺治帝之所以重要和对他的影响，不在于传教。

汤若望为了回答某些传教士指责他对皇帝劝化不力，故《回忆录》中过多描述皇帝接受教义的专心和对天主的虔诚。平心而论，面对一个所崇敬的长者，作为皇帝的尊严，他能对汤若望的信仰持鄙视讥笑、不屑一顾的态度吗？正因为他年青，有好奇心，容易接受新奇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也相信教义。比如汤若望在讲解“十诫”的第一条，反复说明天上只有唯一的真神天主，其他所谓佛、神、道、鬼都是愚昧无知的迷信。特别要皇帝远离和排斥喇嘛教。从这一时期顺治的某些言论即可窥见其影响，如：“喇嘛竖旗，动言遂鬼”，“不过欲惑人心耳”，又说：“朕思孝子顺孙，追念祖父母父母，欲展己诚，延请僧道，尽心焉耳，岂真能作福耶”。⑱但是，汤若望只看到对他有利的一面，他忽视顺治帝所统治的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几千年形成起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哲学观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一直是维系这个民族大家庭的有力支柱。顺治帝是当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表，企图通过劝化使他皈依西方宗教，谈何容易。

其实，正是在两人交往最密切、汤若望受宠最隆时间，顺治早就表明他对天主教的看法。1657年（顺治十四年）赐天主堂碑文中，明确指出：“朕巡幸南苑，偶经斯地，见神之仪貌，如其国人，堂牖器饰，如其国制，问其几上之书，则曰此天主教之说也。夫朕所服应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籍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诸书，虽曾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顺治帝此诸后世的自我解剖，宣布他只崇信孔孟儒家学说，讲求中庸之道。天主教乃国外货，不知其说。其态度跃然纸上，一目了然。1658年开始，他悄悄去延请僧侣禅师，探索佛学的神秘世界。

---

①著名传教士弗朗兹沙勿尔语。
转引自魏特《汤若望传》。
②⑭《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③《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四十七。
④⑨⑫⑰魏特《汤若望传》。
⑩木陈忞：《北游集》参见《陈垣学术论文集》。
⑤⑥⑦⑪⑱《清世祖实录》卷五、六、七、八、八、七。
⑧1900年5月18日《给耶苏会总会长的信》。
⑬龚鼎孳《汤若望七十寿序》见黄伯录《正数奉褒》。
⑮1657年3月钦赐北京天主堂碑文。
⑯《圣经·出埃及记》、《传十诫》。